

# 杨炼：幻灭中的诗意图反抗

**编者按：**1988年8月8日，杨炼离开中国，开始漂流。20多年来，新西兰、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德国、英国……他四处游历，至少在二十多个国家居住过。他活跃在世界文坛上，他不停参加世界文学、艺术及学术活动，被称为当代中国文学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近年，他也接受了不少国内媒体的采访，回顾他将近三十年的诗歌生涯。

## 母亲的去世开启诗歌生涯

**凤凰网文化：**为什么说是母亲的去世开启了写诗的生涯呢？

**杨炼：**1976年1月7日。我母亲在那天猝然病逝。那一刻，“死亡”突然撕下伪装，粗暴、毫无隐晦地呈现在眼前。突然之间，诗，作为一个灵魂的存在的意义凸显出来了。我刚满20岁，那场告别，几乎瞬间改变了我的写作性质。我第一次用我的舌头品尝到真正的诗意，之后才有了语言上、思想上、学识上的理解。后来，我在离圆明园废墟不远的旧居书房里，抄下过圣·方济的一句话：人，是在世界抛弃他的刹那得救的。

《叙事诗》里选了一些我小时候的照片，这些照片旁边有我母亲当年记录的照片信息，这部诗集是在我母亲去世30多年之后才开始写的，但是这个时候突然发现我母亲的这些手迹，都像是最早写给我的信，或者说我所有的诗都在回应她的这封信。我的照相册里有一张照片，是我大概出生了一两个月，我妈妈的一双手抱着我在一个澡盆里洗澡，我妈妈的手只有胳膊，我是光屁股的小孩。我就把这个照片的提词写成一首诗，叫《母亲的手迹》，它的韵是ABA，BCB，CDC，然后转回来。

## “朦胧诗”不是诗人自己贴的标签

**北京文艺网：**读你的诗给我的感觉，正如你接触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明朗通透，又有着某种文化意义上的深邃和厚重，就是看上去不怎么“朦胧”。事实上，你被认为是“朦胧派”的代表诗人之一，尽管你和这一群体里的北岛等诗人总体感觉比较疏离。我不确定你是否认同“朦胧诗”的称谓，是否认同把“朦胧”看作你早期诗歌突出的美学特征？

**杨炼：**说到朦胧诗，我们都知道，这个词不是我们这些诗人自己给自己的美学命名的。要知道，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也就是“文革”结束以后，当时我们面对的社会文化，特别是文学状况，可以说是相当的贫瘠。我们已经习惯了宣传、标语口号式的语言。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我们离开“无产阶级专政”、“历史辩证法”、“唯物主义”这样空洞的政治词汇，而是返回到比较朴素的“月亮”、“土地”、“黄河”、“长城”、“石头”、“阳光”、“绳索”等意象，来表达我们自己的时候，反而让习惯口号的读者看不懂了。因此，“朦胧”说到底就是表示“不好懂”。这是当时看起来特别“另类”的我们的诗歌给那些特别“正常”的读者留下了一个印象。

## 现在中文诗歌的世界分量源于3300年传统

**凤凰网文化：**你算是中国少有的仍在海外活跃的诗人，在你看來，中国诗歌在国际上的分量是怎样的？

**杨炼：**如果说中国诗歌拿到世界上有分量，在国际最重要的诗歌节获奖等等，说白了人家信你，不是光信你一个人的创作，他是信你背后整个非常深刻的诗歌传统。一直穿过李白、杜甫、李商隐、李后主，苏东坡，穿过所有辉煌的名字，一直追溯到屈原，中国诗歌史的第一个名字，之所以他信你，是信一个3300年以来，自从语言创造以来，不停地在自己的语言里创造性转型的历史。我说是精神的血源上，屈原式的《天问》，向宇宙提问的这样一种能量应该一直



1. 2014年2月，杨炼接受凤凰网采访。  
2. 杨炼在伦敦“唯一的母语”私人赞助艺术系列上朗诵。  
3. 杨炼在其所策划的艺术展上。  
4. 2012年，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颁奖仪式上，阿拉伯诗人阿多尼斯（左）介绍杨炼。

贯穿到我自己的创作里。但是另一方面，我的创作又必须是一个当下中国的创作。

## 好诗歌有追问的力量

**北京文艺网：**衡量诗歌作品的优劣，是否有什么标准？

**杨炼：**我想并没有什么标准，但内心会有一种清晰的声音告诉你，会让你判断这是否是一首好诗。当然普通读者的感受或许没那么强烈。所以，我还是要强调专业的眼光，就像我总是反复使用“深度”这个词。深度，并不是故作深刻状，也并不是玩深沉的概念。深度其实指的是内涵。你比如说屈原，他对人生的那种彻底追问的态度，那种追问的能量，对人生深刻的思考，还有体现在诗歌形式中的那种高度创造性……这些在我的理解里，都是深度的体现。当然，这样的深度，如果没有自己独特的语言来描写，还是不行。在我们这次举办的“国际华文诗歌奖”的来稿中，我读到农民工写的一首诗，写广东富士康跳楼事件。那首诗有一个单独的短句“垂直的死亡”，让我印象极其深刻。当然这首诗除了这个短句外，前后还有一些描写，让你明白它写的就是跳楼，但如果不是让农民工来写，可能就写不出这种感受，这就是语言的深度。讲再多空话都是没有用的。能用这样一个句子，抓住那样一个瞬间，实际上你就抓住了诗歌。

## 诗歌的能量能够打破局限，具有世界性

**凤凰网文化：**中文诗歌如何跟外国诗歌沟通？西方的读者怎么看现代汉语或者说当代中文诗歌？

**杨炼：**当代中文诗是古典诗歌的创造性发展，又和西方诗歌完全不一样，但是在神髓的意义上，和西方诗或者其他地方的诗比如说阿拉伯阿多尼斯的诗，有精神上的沟通感。我和阿多尼斯一起在国际诗歌节朗诵，阿多尼斯朗诵《公元前2001年911》，不是公元后，而是公元前，通过打开和打破时间的局限性，把911变成一个无始无终的人类存在，而我朗诵《大海停止之处》，同样也是把中文的语境变成囊括古往今来人类历史的人生促进。所以这个意义上头，

我们内在的沟通很清晰很深刻。

西方的听众在我朗诵之后，众口一词的说法是，尽管一个中文字都不懂，但是朗诵之间诗歌的能量，和语言沉甸甸的质量，可以清清楚楚地感到。所以我发现英文、法文、德文、南非、波兰、日本等等所有的语感，听众说法完全一致。在这个意义上，应该承认汉语这种音乐的可能性是打通世界的。因为汉字的音乐层次不是简单的音响，它是声音和音调两个层次组成的，因此写诗本身就包括给语言作曲这样一个层次。如果一首诗没有作曲构成的音乐能量的话，它是不能够真正存在的。

## 中国诗人缺的是深度和耐力

**南方周末：**你多年在国外接触和参与国际文化和文学交流，相比之下，你觉得中国诗人缺乏什么？

**杨炼：**中国诗人缺的不是聪明，中国诗人缺的只是深度，耐力，没有长气，不能发展自己。中国的诗歌，每一拨诗人都在从零开始，因为已经走完的路，就是小聪明的那几步圆舞曲，重新跳一遍。中国诗歌没有真正的思想积累，到现在为止，我认为还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当代中国诗歌传统，传统是指有积累，有发展，有自觉的一个过程。比诗人还难得的就是好的诗歌批评家，因为他们是直接建立判断标准的专业群体，而他们的批评实践就是价值判断。

当年我们被称为朦胧诗人，我们被称为反传统，甚至被人批评西化。但实际上我们通过真正的跟诗歌有关的思维，衔接了中国古典诗歌，通过我们对自我的追问，衔接上了我称之为屈原《天问》的传统，以及杜甫的七律那种极端和无比精美的诗歌形式。所以我们当年那些被称为朦胧诗歌的作品受到过影响的远不是波德莱尔，其实真正呼应我们内心的是古典诗歌。

## 好的文学作品应该反抗自身

**南方周末：**作家怎样建立有价值的写作？在国际化的写作中更容易建立标准么？

**杨炼：**对整个人的根本性处境的思考。对人性的根本性处境的体验在国际化写作中更为彻底。我不认为强调外在困境一定能给作品加分，你的分数就

是自己挣的，九十分就是九十分，没深度搁哪儿也没深度。为什么像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这样的东西，我看了以后很感动。它没有那么政治化，虽然帕慕克在现实里是一个对土耳其政府，尤其是对那里的宗教思想控制持反对立场的作家，但他的作品我看到更多的是自我反省，自我追问，是他对广博知识的占有，对艺术丰富性的深刻理解，是他充沛的创造力，这样的作品搁在手里沉甸甸的。真正的最严酷的处境就是“我自己”，最根本的绝境就是“我自身”，所以一部文学作品如果要反抗，就是反抗这个界限。

## 二十年海外漂流生发诗意图反抗

**南方周末：**在海外二十年的漂流，你的思想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杨炼：**最大的变化就是以往的思想得到了确认和加强。这个确认是建立在冷战之后，本来以为资本主义一统天下，以为这个世界大同了。但是十年一觉扬州梦，到“9·11”一声爆炸，突然之间这个梦破碎，人们发现这个世界面临着更加血腥和严酷的现实。而且全球资本主义带来的这种感受，实际上是更极端的绝望，因为在意识形态冷战时期，人们似乎还可以在两大思想阵营之间寻找一种选择，今天则是放之四海而资本主义。这个时候，我原来拥有的人性永恒的处境就是幻灭，这种黑暗感很久笼罩着我。这是为什么我后来生发出诗意图反抗的意识——我的反抗有几个阶段，政治的反抗，文化的反抗，最终落实为诗意图的反抗。

诗意图的反抗定义就是全方位的困境和个人反抗。我突然发现我跟整个传统文化的精神联系，确实我的诗歌创作一直在不停地回到屈原的《天问》，他是从宇宙开创之初问起，穿透整个神话历史和社会现实，回到诗人自我，屈原叩问二百个问题，没一个有答案，他不停地用更深的问题涵盖以前的问题。这种专业提问者的姿态，就是我们今天作为诗人和思想者的姿态。

## 一直尝试定义自己

**中国新闻周刊：**作为一个诗人，你的经历似乎有些复杂，如今你又在策展艺术活动。如果你必须有一个自我介绍，你会怎么介绍？

**杨炼：**我曾问过自己：你怎么命名这个诗人？他生于瑞士，长在中国，持新西兰护照、美国和澳大利亚绿卡，常住伦敦，刚在意大利获奖，正在给《法兰克福报》写稿，将去魏玛演讲，无论在哪，他写的始终是中文。他的文学属于什么文学？我用了20多年一直在尝试解答这个问题。

直到现在我还没有确定答案。最初自认是“中国的”诗人，这是一种根本性命运。但在国外漂流途中，我和非洲诗人交流时，我们思考的问题、对人生处境的理解极其相似。当一个美国诗人和一个伊拉克诗人并肩朗诵，仔细听他们诗里的人生经验，可能没有根本不同。我觉得“中国的”概念过于狭窄。我应该是一个“中文的”诗人。后来，我写完《同心圆》，人们说它太极端。我就想，那种全而统知的中文可能根本就不存在。最后，我就干脆说我写的是“杨文”——Yanglish。诗歌本身就是在寻找一种极端的语言经验，把极端的人生经验写清。

## 伦敦从异乡变本地

**中国新闻周刊：**这些年在伦敦生活得怎么样？这个城市对你意味着什么？

**杨炼：**1997年刚到伦敦时，我盯着那个标明Stoke Newington的邮政地址，想象它的命运——可能又是一行还没记住便被遗忘、缩小、埋进履历表的字母。可四年后，我竟还在同一个地址，同一个厨房，视线看向同一个后花园中的苹果树，就知道这座城市和我的关系变了。这个异乡变成我在外国获得的“本地”。

**谢怡华综合凤凰网、北京文艺网、南方周末、中国新闻周刊**